

中外文化与文论 Cultural Studies and Literary Theory

第 57 辑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

四川大学国家级重点学科
比较文学研究基地

主办

“重写文明史与
重写各学科史”之二



四川大学出版社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目 录

1 前 言

曹顺庆 杨 清

重写文明史与各学科史

- 3 论重写世界文学史的视野与方法 高旭东 常海波
20 自然科学与文学思潮
——西方文学史重写的两个维度 蒋承勇
31 加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史书写的主体意识
——以比较文学教材编写为中心 李伟昉
41 论王国维文学批评的过渡性 高 玉 陈绍鹏

重写比较文学学科史

- 53 比较文学：从民族国家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李 涯 陈佑松
68 文明互鉴与中国灰姑娘故事的西方书写 张莉莉
77 戏剧：一种文明史观的“身体言说”方式
——论东方戏剧观的发轫与对西方戏剧观的再认识 韩 聃

重写世界文明史

- 92 文明书写的范式演进：基于世界文明书写的历史
考察 赵渭绒 孙盈睿
106 印度文明史书写及其对重写文明史的启示 尹锡南 邱晓莹

- | | | |
|-----|----------------------|---------|
| 121 | 人工智能时代文明史的再思考 | 庄佩娜 祁伟伟 |
| 133 | 相对的中心与边缘：从文明史再论东西二元论 | 杨 清 |
| 147 | 巴黎藏巴布尔《阿鲁兹》的波斯语文献来源考 | 阿拉法特·艾山 |
| 183 | 世界文明史的新叙述与新策略 | 黄宗喜 姚欣雨 |

重写世界文学史

- | | | |
|-----|--|---------|
| 193 | 重写文明史视域下世界文学（批评）史重构
——从哈罗德·布鲁姆的世界文学批评书写谈起 | 曾洪伟 |
| 211 | 宇文所安文学史观及其编撰思想嬗变研究 | 孙 太 |
| 222 | 传承、互鉴、发展
——新文明观视野下的中国现代文学定位思考 | 唐 敏 |
| 234 | “世界诗性”的潜质性与世界文论的生命性新质生成 | 张宏辉 郑春兰 |

重写文化史和思想史

- | | | |
|-----|--|---------|
| 251 | 语言接触与文明互鉴 | 蒋 维 汪启明 |
| 266 | 研术练辞：《文心雕龙》学术研究和学术写作的
范式意义 | 李 凯 |
| 284 | 论朝鲜朝文人纪行录中的“青鹤洞”书写 | 马金科 李安娜 |
| 297 | 互鉴中重写墨学史：刍议“三元组”结构的“中源
西传” | 聂 韬 王周璐 |
| 322 | 译介变异学视角下杨炼诗歌《同心圆》英译变异
研究 | 杨安文 谢江妮 |
| 340 | 英美中心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
——现代英语戏剧的编史学 | 陈 鑫 |
| 353 | 《维摩诘所说经》英译初探 | 常 亮 张卜懿 |
| 363 | 辜鸿铭儒学经典译作的跨文化传播话语价值研究
——以《大学》《中庸》为例 | 周昊宇 |

宇文所安文学史观及其编撰思想嬗变研究

孙 太

摘 要:文学史观是学者对文学发展历史总体认知与编撰观念的集中呈现,不同的文学史观往往制约着学者的文学史编撰实践,形成特色迥异的文学史著作。哈佛大学著名学者宇文所安有着长达数十年的中国文学史编撰实践,通过对其文学史观的系统研究可以窥探出其文学史编撰的观念及编写思路的嬗变。遗憾的是,宇文所安多元而嬗变的文学史观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本文拟从纯文学史观到大文学史观、新历史主义文学史观、文学史非朝代史观三个维度对宇文所安独具特色的文学史编撰观念进行系统阐述。^①

关键词:宇文所安 纯文学史观 大文学史观 新历史主义文学史观 文学史非朝代史观

截至目前,国内学界研究宇文所安文学史观的文章仅有三篇:即王敏的《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史观及文学史研究法》,邓伟的《从“史中之史”到文学“话语体系”——宇文所安文学史观摭论》,以及史冬冬的《在传统中破执——论宇文所安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观》。王敏论述了宇文所安的文学史非朝代史观,邓伟分析了宇文所安“史中之史”文学史观,史冬冬从结构破执、观念破执和话语破执三方面阐述了宇文所安的文学史观。这些文章都各具价值,但对于宇文所安多元文学史观及其编撰思想嬗变的研究还略显不足,还有进一步拓展和深挖的空间。

宇文所安一共撰写了四部中国文学史,它们是1977年问世的《初唐诗》,1981年付梓的《盛唐诗》,2006年面世的《晚唐》,以及2010年与孙康宜合作编著的《剑桥中国文学史》。除此之外,宇文所安还有几部具有文学史性质的著述,如《韩愈和孟郊的诗歌》《中唐文学文化论集》等。在近半个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书写历程中,宇文所安的文学史观并非始终如一,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呈现多元而嬗

变的特点。

具体而言,宇文所安多元而嬗变的文学史观包括:从纯文学史观到大文学史观、新历史主义文学史观、文学史非朝代史观等。稽考宇文所安的文学史观,梳理其文学史观的发展脉络,考察其文学史观在文学史书写中的得与失,对于学者陈思和等人倡导的重写文学史,以及学者曹顺庆先生呼吁的重写文明史、重写各学科史等,都不无裨益。

一、从纯文学史观到大文学史观

宇文所安的纯文学史观主要见于《初唐诗》《盛唐诗》,以及具有文学史性质的《韩愈和孟郊的诗歌》,三书在诗歌历史之外没有言及其他,属于纯文学史的范畴。宇文所安选择纯文学史观并非偶然,而是因为当时英语世界的中国文学史书写已从杂文学史时代进入纯文学史时代。

在《初唐诗》《盛唐诗》《韩愈和孟郊的诗歌》中,宇文所安以诗歌为文学史建构主体,采取以诗带史的文学史书写策略,对作品进行文本细读和互文解读。据笔者统计,《初唐诗》《盛唐诗》《韩愈和孟郊的诗歌》三书完整引用的诗歌分别是200多首、近200首、150多首,若加上局部征引的其他诗歌,三书实际引用的文本数量则几乎翻倍。宇文所安唐诗史书写的文本中心意识以及纯文学史观由此可见一斑。

宇文所安将纯文学史观融入文学史写作的同时,偶尔也会谈及自己的纯文学史观,如在《初唐诗》开头,宇文所安强调说,好的诗歌史应该回到诗歌本身,让诗歌自己发声,让文本自己说话,“好的文学史总是回到诗作本身”^①。又如在《韩愈和孟郊的诗歌》开篇,宇文所安写道:“本书的阐述方式是选取一些诗歌,按年代顺序,然后对其进行广泛的分析和比较,以描述韩孟诗歌的发展。”^②

宇文所安所写的唐诗史不仅以纯文学为中心,其写作本身也是文学化的,是“文学化的文学史”。如骆宾王的《在狱咏蝉》短短八句,竟被宇文所安演绎成几百字的美文:

日循黄道西行,蝉鸣不绝于耳,此乃秋日迹象。蝉声启我乡愁,如

① 宇文所安:《初唐诗》,贾晋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三联版“序言”,第2页。

② 斯蒂芬·欧文:《韩愈和孟郊的诗歌·导言》,田欣欣译,天津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5-6页。

晋之楚囚，头戴南冠，以示故国之思。我本南人，身陷北地，与钟仪何异？狱中独诵《白头吟》，不期秋蝉振翼，状如美人发卷，飞临囚窗聆听，情何以堪。司马相如负心，文君曾赋此诗，人虽异代，其心同悲……^①

宇文所安从不拘执于单一文学史观，而是秉持求新、求变、求突破的学术自觉，反对呆板僵化的文学史叙事。他曾在《初唐诗》里写道，“我希望有一天带着新的视野回到文学史”^②。宇文所安所谓以新的视野重返文学史，或包括文学史书写从纯文学史观向大文学史观的转型，而《中唐文学文化论集》就是宇文所安以新视野、新史观回到文学史的一次尝试。

在《中唐文学文化论集》的标题里，宇文所安首次使用了“文学文化”一词，暗示了从纯文学史向文学文化史的转向，以及从纯文学史观向大文学史观的转向。在该书的“导论”里，宇文所安特别指出，该书“具有文学史性质……透过不同类型的文本和文体探讨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问题……与文化史或社会史等更大的领域息息相关……这里所讨论的文本本身就是文化史的一部分”^③。宇文所安唐诗史书写从纯文学史观向大文学史观的嬗变，由此可见。

“大文学史”一说最早见于谢无量 1918 年出版的《中国大文学史》里，该书虽以大文学史自称，实为一部杂文学史。“大文学史观”一说是 20 世纪后期才出现的，与当时北京、上海学者关于重写文学史的呼吁、讨论和实践有关。所谓大文学史观，在学者李怡看来，就是超越狭隘的纯文学理想，跨越文学作为纯艺术的藩篱，“在广泛的社会历史联系中发现文学创作的意义和趣味”^④。亦如学者赵涓绒所言，就是要有“跨界”和“融通”的意识和视野，“打破学科固化思维……实现学科边界拓展”^⑤。

宇文所安的大文学史观在《中唐文学文化论集》里只是初见端倪，在《晚唐》则更趋成熟，这从目录中的小标题即可看出，如第一章“背景”，第二章“老人”，第九章“道教”等，无不指向文学与文化、文学与政治、文学

① Stephen Owen, *The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148-50.

② 宇文所安：《初唐诗》，贾晋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年，“致中国读者”，第 2 页。

③ 宇文所安：《中唐文学文化论集》，陈引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年，“导论”，第 1 页。

④ 李怡：《开拓中国“革命文学”研究的新空间——建构现代大文学史观》，《探索与争鸣》，2015 年第 2 期，第 69 页。

⑤ 赵涓绒：《跨界与融通：数字人文背景下比较文学的学科困境及应对策略》，《南通大学学报》，2022 年第 4 期，第 70 页。

与社会、文学与宗教的密切联系。在宇文所安对“晚唐”二字的解释里，实际也暗含了一种大文学史观：

站在过去的大诗人和过去辉煌的阴影里，他们的“晚”主要是一种文化上的迟到感……就这一词语中的“唐”字而言，晚唐应该结束于公元907年，即唐王朝正式结束的时间……然而，如果我们寻找文学文化和诗歌世界的巨变，那么只有到了十一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以欧阳修为主的一群诗人出现时才能找到。^①

宇文所安还是《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主编，以及该书第四章《文化唐朝》的执笔人，“文化”一词再次出现在宇文所安的标题里，其寓意不言自明。《文化唐朝》包括八个子标题：“武后时期”“玄宗时期”“佛教写作”“安史之乱之后”“中唐一代”“最后的繁荣”“唐朝的没落和地方政权时期”“新朝”。从中不难发现，宇文所安关于唐朝文学史的书写不仅远离了早期纯文学史观，还在广度和深度上超越了《中唐文学文化论集》《晚唐》的大文学史观，用宇文所安的话讲，《剑桥中国文学史》乃是“一项现代工程的文学史……一部连绵不断的文化史”^②。

作为宇文所安唐诗史书写的重要指导思想，纯文学史观和大文学史观既有各自的长处，也有各自的先天不足。若从积极的方面讲，纯文学史观无疑是对早期杂文学史观的纠偏和颠覆，是文学史书写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一大进步，既避免了早期杂文学史著作无所不包、犹如杂货铺的学科身份焦虑，也是对纯文学作为文学史书写主体身份的确认和建构。

若以批判的视角观之，《初唐诗》《盛唐诗》《韩愈和孟郊的诗歌》及其暗含的纯文学史观并非没有问题，三书皆有以诗带史、重文轻史的弊端和不足。文学史既是“文学”史，也是文学“史”，二者不可偏废。《初唐诗》《盛唐诗》《韩愈和孟郊的诗歌》在唐诗史的史学层面是失之偏颇的，三书对唐诗演进的社会历史背景叙述不够，缺乏统摄全书的历史主线，读起来或有唐诗选集和唐诗鉴赏集的错觉。宇文所安重文本、轻历史的问题已为柯保罗^③、林理彰^④等人所诟病，但他们没有指出的是，在宇文所安重文轻史的背后，除了作

① 宇文所安：《晚唐》，贾晋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导言”，第5页。

② 宇文所安：《剑桥中国文学史》，刘倩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上卷导言”，第11页。

③ Paul W. Kroll, "Book Review of *The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1979, Vol. 1, p. 121.

④ Richard John Lynn, "Book Review of *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 *Pacific Affairs*, 1982, Vol. 55, p. 287.

者自身原因外，也有纯文学史观先天不足造成的文学史书写失衡问题。面对学界同仁的批评，宇文所安曾撰文回应，承认柯保罗等人的“许多批评是公正的”^①。

在《中唐文学文化论集》《晚唐》《剑桥中国文学史》里，宇文所安增加了文学与文化、文学与政治、文学与宗教等向度和维度，与早期纯文学史观的自足性、封闭性、狭隘性形成鲜明对比。宇文所安的大文学史观是整体的文学史观，是以文学为中心、统摄诸多领域和学科并将其熔于一炉的文学史观，用傅璇琮的话说，宇文所安“以见识的通达和体制的阔大取胜”^②。

纯文学史观取代杂文学史观是文学史书写的一大进步，大文学史观取代纯文学史观也是文学史书写的一次飞跃。同时也应看到，以纯文学史观取代杂文学史观，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中国文学史固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自古以来，中国文学除了诗歌、散文、戏剧、小说之外，还有其他种类如表、书、奏、碑、箴、铭等。同样，以大文学史观取代纯文学史观也会衍生新的问题，如在文学史书写中，文化、社会、历史维度的引入必然会挤占原本属于文学文本的阐释空间，这一现象在宇文所安《剑桥中国文学史》第四章《文化唐朝》里较为明显。在该书里，宇文所安笔下的唐朝文学史多了几分文化的味道，却也少了几分文学审美的味道。

二、新历史主义文学史观

新历史主义滥觞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代表人物包括格林布拉特、海登·怀特、蒙特鲁斯等。在新历史主义视域里，历史与其说是一种客观存在，不如说是一种建构、一种修撰、一种叙述，历史不是唯一故事而是某一个故事，不是大写的历史而是无数个小写的历史。用宇文所安的话讲：“没有一个简单的‘过去的真面目’，我们找到的真实不是历史中的一个瞬间，而是那个瞬间如何生成和建构的过程。”^③

宇文所安的多卷本唐诗史书写，若从时间跨度来看，正好与新历史主义的发生、发展阶段相重合。受其影响，宇文所安反对把文学史视为一连串孤

① Stephen Owen, "A Defense",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1979, Vol. 1, p. 261.

② 宇文所安：《盛唐诗》，贾晋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傅璇琮“序”，第2页。

③ 李宗陶：《宇文所安：中国古诗里有人与人的交流》，《南方周末》，2007年12月1日，第68页。

立的文学时期,反对将文学作品当作孤立的文本现象,主张在多元、动态的关系里阐释文学作品和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包括意识形态、文化霸权、政治权力等。

在《初唐诗》《盛唐诗》《韩愈和孟郊的诗歌》里,宇文所安的新历史主义文学史观已开始萌芽,如对唐代文学经典的解构和重构,就是其新历史主义文学史观的具体表现,在此先以陈子昂为例。宇文所安指出,传统文学史著作把陈子昂奉为初唐最主要诗人,与历史实际并不相符,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是以“沈宋”为代表的宫廷诗,陈子昂的复古诗仅代表一种反对的声音,在初唐影响很小。陈子昂的重要地位是后来文人,如卢藏用、杜甫、韩愈、元好问等赋予的。

宇文所安不仅消解了陈子昂作为初唐最主要诗人这一陈说,还重建了初唐文学乃是宫廷诗的天下这一新说。在宇文所安的解构和建构背后,实际暗含了一些关于文学史书写的启示:若以陈子昂对盛唐及后世文学的影响来看,他无疑是开一代文学风气的伟大诗人,但若将陈子昂放到初唐文学的当下,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文人,在那时的地位和影响无法与杜审言、李峤、沈佺期、宋之问等人媲美,此其一;不仅陈子昂其人其诗需要接受今人的再评价,历代诗论家对陈子昂的评价也需要接受今人的质询和再评价,没有什么是不可置疑的,即便是杜甫、韩愈、元好问等大诗人对陈子昂的评价,也不必视为不可逾越的至论,此其二;看待文学史的视角和视点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会各异,从这个意义上讲,卢藏用、杜甫、韩愈、元好问以及闻一多等人对陈子昂的评价,同宇文所安对陈子昂的再评价一样,都是适当而公允的,此其三。

在《盛唐诗》里,宇文所安反对用名家和天才来界定和划分历史,坚称只有打破盛唐诗等同于李白诗和杜甫诗这一观念,才有可能依据当时的文学标准和时代背景来理解那时的大小诗人。如果撇开盛唐神话,人们就会发现李、杜二人并非当时的代表诗人,那时最受欢迎的诗人和诗歌其实是王维及其京城诗,李白、杜甫及其诗歌被经典化是中唐之后的事。对于盛唐“王孟”“李杜”“高岑”等传统称谓,宇文所安也提出了质疑,认为在这些并称背后存在深刻的差异,“王孟”的诗只是表面上相似:“在他们对隐逸和风景描写的共同兴趣后面,却藏着气质和诗歌个性的根本区别……隐含着深刻的对立”^①;“李杜”的关系也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对等:“他们的著名友谊是一边

① 宇文所安:《盛唐诗》,贾晋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93-94页。

倒的，他们最共同的基点可能是对李白的共同赞美”^①；而在“高岑”二人之间，“除了主题的一致外，他（高适）的作品从未与岑参的作品相似”^②。宇文所安解构这些陈说的可贵之处在于同中求异，将人们熟悉的文学称谓陌生化，鼓励读者重新审视看似相同实则各异的文人组合。

宇文所安的新历史主义文学史观在《中唐文学文化论集》《晚唐》《剑桥中国文学史》里更为凸显。如宇文所安对古代文学文本可靠性的质疑，对手抄本流传历史的追问等，处处显示出新历史主义文学史观带给他的思考和发现。在《晚唐》的第一章，宇文所安指出，今人并不拥有晚唐诗的全部，今人只拥有晚唐诗的“零星片段”，这与印刷术发明之前的“手抄本文化”有关，与古代文学文本有限而脆弱的保存方式有关，因而现存的晚唐诗无疑都是“幸存的诗歌”^③。由于手抄本文化中原文与异文的问题，以及异文多样性、复杂性等特点，这些幸存的诗歌文本其实也是不可靠的，有时很难说出哪个是原文、哪个是异文。

在《剑桥中国文学史》里，在称赞汉语、梵语、希伯来语享有最长文学传统的同时，宇文所安也指出，这些早期的文本都受到了后人的筛选和干预，受到了后世“建构、附增、编订等活动的塑造”^④。这样的例子很多，如在先秦孔子的删诗背后，在《昭明文选》《玉台新咏》的选文定篇背后，都有文化权力的运作和操控，他们不仅改变了古代文本的命运，也重塑了后人对古代文学的体验和认知。这些文学文化“中介”是文学发展历史中的另类历史现象，即宇文所安所谓的“史中有史”。^⑤宇文所安所说的文学文化“中介”，用曹顺庆先生的话讲，就是文学史上的话语权问题，即主流话语对其他话语的遮蔽与排斥：“中国文学史的嬗变从根本上讲是围绕话语权展开的，话语权是考察中国文学演进的结穴所在。”^⑥

宇文所安谈论文学史最多的，无疑是他的长文《瓠落的文学史》。此文对比了历史主义文学史观和新历史主义文学史观在治史方面的不同，如在传统的文学史叙事里，作家和作品的身份都是清晰明白的，他们属于明确而稳定的历史年代，文本的意义以及该文本与别的文本的联系是清楚的。新历史主

① 宇文所安：《盛唐诗》，贾晋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10页。

② 宇文所安：《盛唐诗》，贾晋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73页。

③ 宇文所安：《晚唐》，贾晋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37页。

④ 宇文所安：《剑桥中国文学史》，刘倩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上卷导言”，第12页。

⑤ 宇文所安：《史中有史：从编辑剑桥中国文学史谈起》（上），《读书》，2008年第5期，第25页。

⑥ 曹顺庆，郭明浩：《话语权与中国文学史研究》，《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第88页。

义对传统文学史书写提出了挑战,作家、作品和时代不再是明确而稳定的,而是变得模糊起来,处于不断变化的复杂过程中。若对熟悉的传统文学文化知识及其叙述框架进行必要的重新审视,其结果可能会极大地动摇人们以前对文学的根深蒂固的认知和观念,文学史以前那种确定性因此而减少,但人们的视野和知识却得到了开拓和丰富:“如果你能把许多先入为主的意见暂且放在一边,重新思考这些问题,那么我们自以为已经十分熟悉的文学史就会变得复杂多了。”^①

宇文所安鼓励今人像孩子一样发问,像孩子一样充满好奇心和想象力,重新审视古代文学及其历史问题。宇文所安为此列举了《怀沙》等多个古代文学例子,意在说明具备新历史主义文学史观对于人们认识早期中国文学是非常必要的。《怀沙》被认为是屈原临终前的诗篇,是诗人的绝笔,但问题是在屈原那个时代,竹简是主要的书写材料,他在自投汨罗江时,是不是背了一捆竹简?他是将绝命诗刻在了竹简上,然后自沉的吗?如果是这样,那是谁在荒郊野外发现了那些竹简,然后带回到楚国国都的呢?如果《怀沙》一开始不是书于竹简之上而是屈原的口头创作,“那么是谁把它一字不漏地背诵下来带回文明世界的呢?”^②

新历史主义文学史观有助于宇文所安叩问古代文学史实,但同时也将他自己的文学史论断置于读者的疑问之中。如宇文所安曾在《盛唐诗》里提到一个文学历史问题:何以是杜甫在书写安史之乱,而其他诗人如王维等几乎避开这些战争题材?关于这一现象,宇文所安解释说这是京城诗观念之缘故,而不是诗人们无动于衷:“战争只能在送别、个人叙述及游览战场的诗中顺便提及。所以只有少数诗人描写了安禄山叛乱本身。”^③宇文所安这一解读不无道理,但并不完全令人信服。根据《菩提寺示裴迪》是王维描写安史之乱唯一诗篇这一史实,这里有几个问题是值得思考的:王维这首诗真是在他被叛军所拘时写的吗?如果真是那个时候写的,他为何不担心自己的性命不保?王维如果敢于在被囚时写出反战的诗篇,为何在释放后反而不写呢?王维在平叛后对安史之乱保持沉默,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会不会是另一种情况,即王维为叛军所拘时,根本没有写那首诗,而是在事后补写的,为的是在肃宗面前自证清白,保住自己的性命?如果是这样,这个主意是谁出的,是他

① 宇文所安:《飘落的文学史》,《他山的石头记》,田晓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页。

② 宇文所安:《飘落的文学史》,《他山的石头记》,田晓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页。

③ 宇文所安:《盛唐诗》,贾晋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24页。

自己还是兄弟王缙或是好友裴迪？如果是事后补写的，那么王维不再写关于战争的诗篇，似乎就有了答案，这个答案可能不是宇文所安所说的，即王维等京城诗人不怎么写安史之乱，是因为战争题材只适合送别的场合。王维不再写安史之乱的原因，可能要从别的地方去寻找。

宇文所安关于文学史写作的种种思考和构想新颖而独特，如在下引文字中，宇文所安提醒文学史家从以前的一元或有限视角转变为多元视角，其中暗含的新历史主义文学史观一目了然：

我们失去了一个单一的视角，得到的却是不断变化的多重视角。我们现在已有的文学史充满自信，我所提议的文学史却无定无常……也许这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为了更好地描述我们所知道的东西——以及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①

三、文学史非朝代史观

文学史非朝代史是宇文所安文学史书写的又一指导原则，但他并不简单地否认文学史之朝代分期法，而是认为那种分期法是一种古老的形式。在《韩愈和孟郊的诗歌》里，宇文所安写道，“政治史并不总是和文学史同步”^②；还指出：“初唐，实际上只是南朝宫体诗的延续，并没有形成自己时代的独特风格。”^③宇文所安这句话其实暗含了文学史非朝代史的意思，即政治的初唐虽已开始，诗歌的初唐却还部分停留在南朝文风上。

一般认为，诗歌的初唐从公元617年唐朝建立开始，延续到大约712年玄宗即位。但是细心的文学史家会发现，初唐诗歌就其题材和风格等方面来看，其实要比政治范畴上的初唐久远得多，初唐既是对南朝后期和隋朝诗歌传统的继承，缓慢地结束了漫长的宫廷诗时代，又逐渐演进到后来的盛唐时期。从梁朝到7世纪后期，除了初唐四杰、王绩、陈子昂等人的复古诗论外，这一阶段的文学并没有产生多少新的东西。从梁到初唐，就其诗歌特征来说，是可以归入一个时代的。但问题是，如果不用朝代划分文学史，那该怎么办呢？宇文所安也有同问，并在《瓠落的文学史》里这样解释说：

① 宇文所安：《瓠落的文学史》，《他山的石头记》，田晓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页。

② 宇文所安：《韩愈和孟郊的诗歌》，田欣欣译，天津教育出版社，2004年，“导言”，第2页。

③ 宇文所安：《韩愈和孟郊的诗歌·导言》，田欣欣译，天津教育出版社，2004年，“导言”，第5页。

可是如果我们不用朝代的概念,那么我们该怎么来给我们的文章、书籍以至在大学教授的课程命名呢?……从政治角度来看,我们当然可以把安史之乱以后的时期称为中唐,但是如果我们把中唐当成一个诗歌史的概念,就会掩盖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很多“中唐”以前的诗人都一直活到了安史之乱以后,而且和安史之乱以前的作家有一种基本的传承……把文学史和政治史锁在一起不是一回事。^①

宇文所安虽然主张文学史非朝代史,但并不认为文学史的朝代分期法应该被取缔,相反这一文学史观其实是用得最多的,是文学史书写模式中的家常便饭:“用朝代的模式来思考文学和文化史当然是可以的,但这一模式已经成为家常便饭……假使我们换一个角度……会看到我们以前从未注意到的因素。”^②

文学史的朝代分期法依然有其生命力,只是显得过于熟悉和陈旧,需要建构和提出不同的文学史观,才能让学者与读者写出和看到更多更新的东西:“按照朝代进行分期的文学史,是文学中的博物馆形式。我们已经拜访了很多这样的博物馆,它们是我们整理阅读经验的熟悉模式。这种理解模式并不算坏,但是只有从一个陌生的角度进行观察,我们才能看到新东西。”^③宇文所安还指出,“当我们改变文学史分期的语境,熟悉的文本也会带上新的重要性,我们也会注意到我们原本忽视了的的东西”^④。

宇文所安所谓文学史非朝代史、政治史、社会史的又一案例,是对政治的晚唐和文化的晚唐所做的区分和辨异。在宇文所安看来,作为一个时期,历史的晚唐虽结束于907年,但文学文化的晚唐却又延续了数十年甚至更长,文学史与朝代史不一样,并不存在二者整齐划一的晚唐。在他执笔的《剑桥中国文学史》第四章里,宇文所安直接将篇名设置为《文化唐朝》,无疑也是基于文学史非朝代史这一史观的。文化唐朝,即整个唐朝的文学文化史,在宇文所安看来,始于650年(晚于唐朝建立33年),止于1020年(晚于唐朝灭亡113年),其中包括了五代和宋初60年。

① 宇文所安:《飘落的文学史》,《他山的石头记》,田晓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页。

② 宇文所安:《中唐文学文化论集》,陈引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三联版前言”,第2页。

③ 宇文所安:《中唐文学文化论集》,陈引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三联版前言”,第2页。

④ 宇文所安:《中唐文学文化论集》,陈引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三联版前言”,第1-2页。

宇文所安虽倡导以新的文学史书写范式替换朝代分期法，但实际操作并不容易，原因很多。宇文所安认为，即便扬言要与朝代分期法分道扬镳之文学史家，在真正撰写文学史时，仍然难以完全摆脱这一范式：“将文学与政体等同起来的一个后果便是按照王朝与统治时期做出文学分期。即便是二十世纪汲汲于革新的文学史家亦未能免俗。”^① 朝代分期法不能有效描述文学史的演进逻辑和重要变化，但朝代分期法可谓积重难返，依然频繁出现于多数文学史著述中，成为文学史著作的章节标题。宇文所安坦言，他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也有这一问题，只不过分期之起止时间与过去相比或有差别，有的差别还较大，超出百年以上。实际重新检视已有文学史及其书写范例虽然必要，全盘否定和完全拒斥文学史之朝代分期法也是不妥的。

需要指出的是，文学史非朝代史这一文学史观并不新颖，早在民国时期，傅斯年曾说：“不能以政治的时代为文学的时代……文学时代之转移每不在改朝易代之时，所以我们必求分别文学时代于文学之内，不能出于其外，而转到了政治之中。”^② 文学史非朝代史也是黄人的文学史观，而在钱锺书“诗分唐宋”的命题里，其实也暗含了文学史并非朝代史的文学史观。

总之，宇文所安的唐诗史书写表明，文学史观不同，写出的文学史也会不同，若文学史观过于单一，写出的文学史就会趋同化、程式化、脸谱化。宇文所安的文学史观多元而嬗变，如纯文学史观、大文学史观、新历史主义文学史观、文学史非朝代史观等，这种集多种文学史观于一体、一炉而冶的文学史书写策略，为他的唐诗史书写建构了个性化、多元化、异质化的维度。同时，宇文所安的文学史观在文学史书写中的得与失，也值得国内外同仁参考和深思。

作者简介：

孙太，文学博士，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① 宇文所安：《剑桥中国文学史》，刘倩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上卷导言”，第21页。

② 傅斯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第4页。

证书编号: 222930S23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收录证书

根据《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集刊）遴选办法》，**《中外文化与文论》** 入选为CSSCI
(2023-2024) 收录集刊，特发此证，以资证明！

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
Center for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and Assessment

中国社会科学
评价中心
2023年6月

